

1931—1945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

第一辑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

K265.61-53

0
2:1

1931—1945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文化厅机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875印张 230,000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206-00386-9

C·28 定价: (平) 3.70元

(精) 5.00元

139760

本辑责任编辑组

主 编 王承礼

副主编 孙继武

编 辑 李茂杰 辛培林

孙玉玲 霍燎原

孔令波

目 录

- 试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的国际关系……步 平 (1)
-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与国际形势……沈一言 (16)
- 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概述……赵冬晖 (25)
- 热河事变与长城抗战……邓一民 (37)
- 试论伪满法令的殖民地特点……郭素美 (48)
- 日本帝国主义的“皇民化”政策和朝鲜族人民
反“皇民化”的斗争……韩俊光 (59)
- 伪满“国民训”的反动实质……赵聆实 (71)
- 关于东北沦陷十四年经济史研究……孔经纬 (82)
- 日伪统治时期东北殖民地经济形态的形成、深化
及其特征……王希亮 (91)
- 有关《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几个问题……苏崇民 (104)
- 略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关东州”的税收……李治安 (118)
- 东北沦陷时期的经济特征……李作权 (124)
- 日本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满洲重工业开发株
式会社……郑 敏 (141)
- 日本移民侵略的实验村——爱川村
……姜瑞起、王子平、靳宝民 (153)
- 试论日本移民侵略的根本动因
……靳宝民、白世雄 陈丽丽 (163)
- 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主义教育……赵家骥 (173)
- 试论伪满的国策电影……胡 昶 (184)
- 试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新闻报业的垄断
……郭 君 陈 潮 (193)

试论日本对大连的思想文化侵略与统治	杨洪范 杨力生 (203)
论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我国东北沦陷区进行对苏进攻准备的问题	李茂杰 (213)
略论东北抗日战争的特点	孔令波 (224)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特点初探	车霁虹 (237)
试论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	王笑竺 高月泽 (249)
试论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游击战争史阶段划分	杨金高 (259)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成立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刘大奎 (264)
浅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分兵远征的历史作用	杨兴全 (272)
抗联一军内线作战思想的形成	周宇枢 阎瑞成 (281)
抗日战争中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秦奎一 (291)
芦沟桥事变前后东北人民抗日战争述略	霍燎原 (301)
评伊东先生的《满洲问题的历史》	常 城 (315)
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问题述评	任万举、张玉芝 吴文廷 (328)
编后记	(339)

试论“九·一八”事变前后 东北的国际关系

——兼论中国政府在国联的外交活动

步 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东北一度成为国际上十分令人关注的所在。对东北命运的关心以及该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都对事态的发展随时作出反应，不断表明态度。中国的外交活动也在此形势下展开。本文拟对当时围绕中国东北的国际关系与事变的联系略作分析，兼谈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

一、“九·一八”事变前围绕东北的远东国际关系格局

“九·一八”事变后，英、美、苏等大国均作出了各不相同的反应。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对事变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时遵循的综合价值标准，即外交行动的基本动因究竟是什么？事实证明：笼统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并不能约束其外交行动，信誓旦旦宣布的原则也不过是应付局面的外交辞令。归根到底，动因源于在国际关系中形成的各自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正如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摩根索分析的：“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就是“国家利益”。^①因此，以国家利益为线索考察“九·一八”事变前围绕东北的国际关系，乃是评价各国对事变反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时间上看，上述各大国同中国东北的利害关系自上一世

纪中叶即开始,其中俄、日、美三国在中国东北的角逐更为激烈,构成“九·一八”事变国际背景的远因。俄国与日本自1895年“干涉还辽”事件后即结下了宿怨,从此在东北利益上争执不休。虽经过1904—1905年的战争后两国势力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又经过两国间几度订立密约而加以肯定,可是两国的矛盾却因各怀必欲非斥对方而独霸东北的野心而难以调和。其间,美国又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武器,企图在日、俄控制的东北打入楔子。于是,它先联日拒俄,继而又与日本对抗。然而,从哈里曼到诺克斯,试图进入东北的举动屡屡受挫。因此,它对日、俄均耿耿于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帝国主义集团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冲突一度相当尖锐。但是,这一冲突却未能缓和各国围绕东北利益的对峙局面。一方面,苏联尚未放弃对中东铁路的权利,且与东北有数千里共同边界线,对远东地区的安全问题十分敏感;另一方面,日本充分利用了第一项世界大战与帝俄垮台的时机在东北扩充势力。193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约9.12亿美元,为1914年的4.5倍,其中63%投到东北,为美国投资约60倍。^②而美国的国民财富却几乎超过欧洲,黄金储备属世界半数,自然要竭力阻止日本单独霸占中国的投资领域。可见,在围绕中国东北的各国冲突的局面并未改变的情况下,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则加剧了这种关系的复杂性。

从空间上看,东北的国际关系还处于更为复杂和宽广的国际环境之中,即有远东及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强国在争霸世界和利益分配时出现的各种矛盾影响尤为强烈。当时,帝国主义战胜国根据力量的新的对比,经过斗争和妥协,暂时达成了协议,构成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新体系,即凡尔赛体系;同时,出现了国际联盟这一新的机构。但是,因凡尔赛体系只是调整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却未能体现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的美国的要求,美国

拒绝加入曾是由它提倡建立的国联，加深了与英、法、日等国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表现在西方，如美国加强向英国自治领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渗透，用贷款和投资排挤英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等，而且在远东的中国东北，也投下了大国争霸的阴影。美国利用军事和经济优势，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进入英国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势力范围”；英国愤怒至极，“仇美情绪使两国关系的恶化程度已经开始达到大战前英德关系那样了”。^④日本在大战期间加强在中国的势力，夺取了比它所能承受要多得多的利益，特别是它向太平洋扩张的步伐加快后，美国便为限制其海军力量的发展而煞费苦心。可是，从华盛顿会谈开始中经日内瓦谈判，1930年又谈到伦敦，结果日本不仅未被限制，相反却“超越了现实”：只有美国人口一半、国民总产值十分之一、领土面积二十分之一的日本，在海军舰艇拥有量上，却享有占美国百分之七十的平等地位。这样，太平洋上剑拔弩张，形势严重。如列宁所预料的：“要防止美日间日益尖锐的冲突是不可能的”^④。在美日有历史渊源的冲突中，英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英国与日本从1902年起三次订立盟约，本是针对俄国与德国的，但战后英、日在对美态度上又趋于一致。虽然在美国的外交努力下通过华盛顿会议订立了《美、英、法、日四国关于太平洋的条约》，终止了英日同盟。但是，在美国面前，英、日两国关系毕竟更为密切。美国参议员洛奇称：“英日同盟在我们与远东和太平洋关系中是一个最危险的因素……它正在支持日本的战争精神和日本在陆上和海上对新冲突的准备。”^⑤

就全面的国际关系来说，它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是多维的、多层次的。我们上述分析不过是选择了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作为线索。即使依据这些线索，也可大略勾勒出围绕东北利益的各大国构成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即关于东北的远东国际关系格局。在这个社会领域或国际关系格局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利

益都被置于多方位的复杂关系网中。当然，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个体系的对立也是其中的一对矛盾。不过，充斥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矛盾和冲突却在某种意义上更有影响，甚至超过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的地位。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外交举动，都只能在对各方位的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后才能得出，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也不例外。因此，分析当时各国的反应及态度，并不能简单地以社会制度的优劣划成泾渭分明的界限，也不能仅使宣言而概括为“支持”与“不支持”两种，应当根据国际关系中各种主要因素的影响给予具体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

二、“九·一八”事变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相互影响

远东地区围绕中国东北利益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既然有历史的渊源，并与更为宽广范围的国际关系相协调，故在一个长时期是有相对的稳定性。发生在局部地区的事件，如“九·一八”事变，既影响原有格局中各个国家和各种矛盾，又受相对稳定的原有格局的反作用，使事件发展与原有的关系相适应。

1. 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与“九·一八”事变

帝国主义集团同苏联的矛盾不仅在远东，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居明显地位。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共产国际的大本营的苏联，招致帝国主义及各国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反对是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活跃在远东地区的帝国主义势力如美、英、日以及仇视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蒋介石政府都是反苏“联合阵线”中的主要力量，其间有共同的目的和要求。只是由于苏联的地位不断巩固，这些反对力量除非到迫不得已时，不敢单独与苏联正面对抗而消耗实力，但又都希望本阵线中有直接进攻苏联的力量脱颖而出。“九·一八”事变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引起的最初反应，即表现在众多国家均企图利用这一时机，把日本推上反苏第一线，努力使其进攻目标继续北上。美联社驻巴黎记

者曾宣称：“全世界都应该感谢日本在远东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⑥美国总统胡佛在事变后提交内阁会议的备忘录中也曾表示了这种心理状态，即只要日本明确说明发动事变的目的是针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和俄国的渗透危险，那么美国即使不与日本一致行动，“但也不提出更多的异议。”^⑦英国出于同样的动机，更明确表示：“日本为远东抵抗苏联的唯一屏障，凡可抵御俄祸之任何行动，英国海、陆军意见，将予以赞助”。^⑧同样，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推行，也基于反苏、反共的立场。因国民党右派一直视中国共产党为最主要敌人，对苏联仍疑虑重重，始终持敌对态度。乃至日本已快占领东北全境时，国民党政府仍在担心“近日传闻日、俄将有日占北满、俄占新疆之说。如果属实，则东省全失以后，所有边患或将次第引起，患隐无穷，关系全国尤大”。^⑨

可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顽固坚持反苏、反共立场的帝国主义集团满怀希望地期待日本成为反苏的先锋。这就是一些国家对事变之初的表态中不明确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笼统表示“遗憾”或“忧虑”，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原因。

2. 美日关系与“九·一八”事变

美国与日本的对立自1905年起便成为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环节，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扩大并企图独霸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虽然出于共同的反苏目的，美日矛盾有可能暂时让位于同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但只能是日本在远东的势力扩展尚不打破美日间势力平衡的前提下，否则，美日矛盾只会逐渐尖锐化。

1931年10月8日，日本军队轰炸锦州，接着又使侵略活动不断升级，表明了决心占领全部东北的意图以及不容他人染指的决心，从而彻底破坏了美日间的平衡。在根本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美国继续以共同反苏名义维持同日本的联合已无实际意义，必须与之分道扬镳。因此，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11月19日召见日本大使出渊时，明白无误地指责了日本对非战公约和九国公

约的侵犯。这是美日在根本利益上的矛盾超过了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标志。翌年1月7日，史汀生又发出了著名的“不承认主义”的照会，表示不承认日本在东北造成的即成事实，“也不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因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⑩

由此可见，美国的态度与事变刚刚发生时相比明显地强硬起来。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并未成为共同反苏的先锋，因为它已经发现苏联“在东方的防务已经大大加强，驻海参崴和边境其他地方的空军且对东京和日本其他重要城市构成严重的威胁。”^⑪东条英机等人当时就意识到，“如果日本不做好同所有西方国家对抗并进行威慑的准备，日本就永远不能攻击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甚至俄国。”^⑫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际表示尊重中东铁路的中立，避免刺激苏联。在欧美许多国家中甚至传说日苏间可能达成了某种默契或谅解。因此，美国对日本北上进攻苏联也感到大失所望。另一方面，美国是华盛顿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的主要签字国，承担了“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义务。尽管美国政府对此承诺难免采取一些实用主义的态度，但因大战结束不久，国民对维护上述公约尚有相当的责任感，不能容忍日本对公约的任意践踏而有损美国的国际威望与信义，故国内舆论相当强烈，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驻日大使曾向本方面强调：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决非史汀生一人所为，“在对待各项和平条约的态度上，美国人民整个来说是坚决支持政府的，毫无同情日本的倾向。”^⑬

美日之间早已存在的对立关系，由“九·一八”事变的发生

和发展而进一步激化，这在外交上对中国是有利的因素。美国当时并非国联成员，但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联行政院的关于中日问题的辩论时，还是“尽量做能做之事”，利用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影响，力促各国在反对日本的决议通过时取果断态度，而出席国联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也积极“借美国的力量压倒日本”。

④ 顾维钧在1933年2月25日致宋子文的信中曾这样描述美国的作用：

“近几个月来，日内瓦有一件值得注意而且是日益明显的事实，即每当国联行政院、大会和委员会研究时，有一个能对会议讨论过程起影响作用的幕后因素，就是美国的态度。草拟最终报告时，伦敦政策的明显转变，法国态度的强硬化，都无疑是美国政府的势力起了决定性作用；李顿报告书中对于‘满洲国’，采取了不承认、不合作的坚定明确的立场，也要归功于这一因素。”⑤

仅就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起的积极作用看，上述分析并不为过。但从总的方面看，美国的对日态度也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它虽然严厉地批评日本，但也避免单独与之对抗。所以在国联中也同时存在另一种顾虑，即许多国家认为美国表态尚不够坚决，特别是在对日实行经济制裁问题上，美国虽执有王牌，但担心“单独进行制裁会导致战争”⑥而始终不予表态，其他国家当然不敢越过美国的界限。美国则抱怨“在满洲问题上早已远远走到国联前面，现在已轮到国联跟上来。”⑦这样，仍然形成了一种观望的局面。

3. 苏日关系与“九·一八”事变

远东国际关系的格局表明：日苏关系中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与帝国主义集团中一员日本的矛盾；另一是作为同样与东北有密切联系、有过多年争斗的背景并处于对峙状态的两个国家间的矛盾。前者偏重于意识形态性质，

后者偏重于国家利益性质。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9月20日的《消息报》和25日的《真理报》上都表示了谴责日本的态度，宣称“尊重和中国所签订的各种国际条约，无条件反对军事占领和军事干涉的政策”。^⑩但是，与此同时，苏联却又在进行着另一种性质的外交活动。事变第二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向日本大使提出不应影响中东铁路的要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也随后提出同一问题。29日，苏联声明对中、日冲突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把中、日两国作为“交战双方”等同对待，然而却允许日军利用中东铁路运送镇压抗日力量的军队、物资，相反，对中国抗日力量如马占山、苏炳文等人的求援却置之不理。1932年12月12日，当国际上对日本的批评加剧时，苏联却恢复了同日本的邦交，同意伪满在苏联设领，对李顿调查团持不合作态度。1933年6月起，苏又不顾中国的不满与反对，同日本、伪满代表坐在一起谈判出卖中东铁路问题，乃至1935年达成协议。此后，当1943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时，苏联党又与日本订立了中苏条约。很明显，苏联在事变之初是竭力防止日本把战火烧向自己，首先考虑的是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为此，它甚至不惜放弃原则与牺牲中国的利益而与日本妥协，而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国土的沦丧与主权的被破坏。

尽管“九·一八”事变事实上并未加剧苏日间矛盾，但在舆论方面，苏联却竭力渲染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危险，宣传日本以满洲作为攻击苏联的军事桥头堡，是国际帝国主义阴谋的一部分的论点。正当中国国土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和蹂躏时，共产国际却号召各国党“积极为保护苏联而斗争”，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仍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而不是全力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似乎中国的沦丧无关紧要，苏联的安全才是关乎世界命运的大事。苏联的作法，无非是使用外交手腕和舆论工具加强自己的地位，从多方面迫使日本放弃北进的方针。虽然应当

承认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仍提供了支持和援助，但它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所作所为至少证明了在实行国际主义时是不彻底的，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原则仍是其行为的主导思想。

4. 英日关系与“九·一八”事变

按照苏联宣传的观点，“九·一八”事变前后，英、美与日本是沆瀣一气，共同损害中国以及苏联的远东利益的。其实，这种分析不能正确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英、美帝国主义只是在事变发生之初对日本进攻苏联怀有一致的幻想，但不久美国即已感到失望，英国态度则不尽相同。英国舆论从事变之初不无偏见地认为满洲的事态“处于善恶各半的状态”^⑩，认为对日经济制裁是“愚蠢的企图”。^⑪1932年初，美国明确表示对日本占领东北“不承认”时，英国却对日本的虚伪声明表示满意。在国联的辩论中，英国经常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有意偏袒日本。英国代表西蒙故意引用李顿报告书中对中国不利部分发难，并左右会议局势，拉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一同攻击中国，英国置中国倍受日本军事侵略而国土沦丧的形势于不顾，称国联如果通过不承认“满洲国”的声明，“会被日本看作是对它的威胁。”^⑫在国联宣布日本为侵略者而中国为被害者后，英国却不经国际磋商，独立宣布既不向日本，也不向中国出售军火，实际是打击不能生产大量军火的中国。英国的大资本家集团的态度更为恶劣，1934年10月班比爵士率英国产业同盟远东调查团赴东北调查后，提出了与李顿调查书截然不同的报告，声称伪满洲国的存在“在国际社会中逐渐成为不可忽略的事实。”^⑬显然，英美两国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别。

英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与态度，也是从其国家利益出发的。首先，它认为只要日本不影响英国在中国的利益，那么主要的对手就仍是美国。因为美国无论是在海上霸权还是在中国的经济地位，都有迅速的发展而向英国提出了挑战。在岌岌可危的感觉下，英国把日本作为在远东抵制美国的重要伙伴，况且两

国间曾有三次同盟的基础。因此，英国不肯冒着与日本反目的危险去指责日本的非正义行为，相反，却作出与日本合作、友好的姿态打击中国而恫吓美国。其次，英国在中国的主要利益并不在东北，当然不肯为别人去“火中取栗”。只是当它的利益受到直接危害时才会作出反应，例如在“一·二八”事变发生之时。关于英国这种狭隘的作法，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曾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指出：“英国一贯只顾它本身的利益，上海事件达成协定之后，他们就不再顾及满洲的问题了。目前由于英国在山东、秦皇岛一带有可观的利益，英国又想充当调停人。这难道是为了我国的利益？”⑤

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国联的外交活动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各大国的反应及采取的相应行动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的，它们的利益当然不会与中国的利益完全一致，至多在某些问题上有可能进行有限的协调。所以在国际上完全依赖某个大国，既使是与日本有尖锐矛盾的国家，也是不可靠和不现实的，但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又必须通过独立的外交活动争取尽可能多的同情和支持，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提高国际地位，这也是外交工作面临的艰巨任务。当时，驻国联的中国代表面对的是日本老练的外交代表松冈洋右。此人从1904年起从事外交活动，辗转任职于俄、美、中国，1927年成为“满铁”副总裁狂热地拥护日本法西斯主义，顽固坚持东北是日本生命线的主张。因此，中国代表取得外交上的主动与成功颇有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外交活动，也应视为抗日斗争的一条特殊战线。从事这条战线的斗争，首先需要熟谙国际关系的各方面，洞悉国际关系中的一切细节，与各国际政治家、外交家保持密切联系。事实证明，中国在国联的外交代表，是尽了一切努力完成任务的。1932年11月28日，国联行政院不顾日本的反对把

李顿调查报告提交国联大会；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又以42:1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谴责日本的最终报告书，松冈被迫退出会议。这些成果虽然距中国的要求很远，但不能不承认它仍然是外交上的成功，而且与中国代表的努力有密切关系。由于多种原因，关于这条战线的斗争情况，尚未予以充分的分析与评价。

影响对中国在国联中的外交活动进行评价的第一个原因是它与对国联的评价交织在一起。

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兴起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主义”思潮推动下的产物。这种思潮打着唤醒人类良知、拯救世界命运的旗号，主张建立世界政府、世界组织或创造对各个主权国家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来促进国际社会的合作，巩固国际秩序，永久避免战争。当然，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科学理论，这种思潮是歪曲了国际关系实质。为帝国主义政策辩护的。实际上，国联不可能如想象的那样成为“世界政府”，它只能被某些大国操纵，成为大国对外政策的附属物，当然不会对这些大国产生约束力。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些年代里，对世界充满梦想的理想主义思潮影响颇大，国联在其最初成立之际，的确被许多人视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场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作为被害国，又是国联发起国之一，在这一讲坛上向日本提出控诉，提请各国注意日本违反巴黎非战公约的行为，是符合国际惯例，也是有好处的，既使许多弱小国家，也都赞成中国在国联的行动。况且中国从事外交工作的主要人物多留学欧美，深受国际关系学说中理想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国联及国际公约的约束力抱有很高的期望，从而积极利用国联讲坛，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经过“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辩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国际间的斗争，证明了理想主义的破产和国联的弊病，现实主义的思潮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国家利益支配外交行动的原则被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中国在国联的行动看起来显得过于迂腐；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影响对中国在国联的外交活动评价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与对李顿调查报告的评价交织在一起。

1932年10月2日，李顿调查报告被公布。报告中的许多分析和观点确实带有殖民主义者的偏见，而且提出了国际插手东北的荒谬主张，对日本的措施也软弱无力，理所当然地受到群情激昂的中国国内舆论的批评。但是，报告的前八章比较注意现实，明确指出了日本侵略东北的性质：“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将向来毫无疑问义属于中国领土之一大部分地面强夺占领使其与中国分离并宣布独立，事实俱在”。报告又强调：“在一切战争及独立时期中，满洲仍为中国领土”，“日方之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而“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华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④很明显，报告的这些认识与结论是对中国有利的，对日本是不利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表态不能不考虑到报告本身的这种复杂的状况而取慎重态度，尤其要注意它公布后产生的国际舆论。当时，许多同情中国的国家认为报告虽有缺憾，但总的对中国有利，表示力争在国联大会上通过，而日本则大为恼火，先是拖延行政院讨论的时间，继而又反对将报告提交大会，声言提出全盘否定的提案，从而在国联大失人心，给中国方面带来了最大程度地孤立日本、争取更多同情和支持的机会。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采取尽量不正面直接反对李顿报告的态度，“今日方先攻击报告书，我方于反驳时说明自己的立场”。^⑤至于报告中虽有于中国不利之处，但因日本早已表示全面坚持抵制的态度，肯定不会对中国产生任何约束力。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关系背景，中国代表把国联讲坛作为揭露和孤立日本的阵地的作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事实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仍坚持了三条原则：一是不得鼓励侵略；二是必须赔偿中国损失，三是日本撤军是先决条件。^⑥由于中国驻国联外交代表所处地位、环境以及肩负的责任同国内各界有明显不同，因此，不能苛求他们在对李顿报告的态度上采取同国内批评舆论完全一致的立场。